

高天恩：在家庭回憶中重溯沙田歷史

歷史二字，仿佛背負著厚重的包袱，遠不及展望未來所隱含的輕省，但畫家高天恩於沙壩角落展出的敘述的保存(A Preserved Narrative)，則混合不同媒介回溯記憶與歷史。透過個人私密且美好的家庭記憶，開展出有關沙田區，甚至香港的文化歷史。她於美國加州主修繪畫，後回港發展，一路上探索著不同的主題與媒介，她關注的一個課題乃其自身家庭歷史。這次作品中的影象，包含了她的舊與新的畫作、家中長輩舊照片和沙田的天空照片拼合而成。當觀眾走進戶外裝置之下，會被泡泡紙保護下的沙田西林寺、畫舫的家庭照片包圍。目的並非沉溺懷舊，乃希望啟發出更深遠思考：我們的過去可以如何貢獻給自己的將來？

Q: 今次的作品延續你對家族史的關注，可否談一談這個主題對你的意義？

其實這次作品與我之前的《Crated Memories》同出一轍，都是關於我家的故事。家中除了弟弟之外，全家都很愛說話。從小到大，媽媽經常反覆述說她的兒時經歷。我聽到的家族故事，大多從我媽媽和婆婆的角度出發。以前爸因為工作關係，經常不在家，他的故事較少聽到，反而近年他多說了，他那邊也是精彩萬分的。所以對我來說，這次的「家族史」反而更像是「家族故事」——家人分享的故事、我記得的片段、家庭相簿中的片段等等。我的媽媽和婆婆都在香港出生，乃真正的本地人，爸爸則出生廣州，五十年代中才來香港，所以我家族的故事，不單止是我個人的，也是這個城市和整個時代人們共享的記憶和經驗，所謂文化遺產（cultural heritage），不過如此。

Q: 那今次的展覽作品是如何發展而成的？與你以往作品有什麼不同？

為了配合戶外展覽場地，這次會以印刷形式製作，而不同於以往純粹的繪畫媒介。我揀選了不同的家庭影像，包括兒時與家人的照片，與一些新舊畫作拼貼起來，再打印成大橫幅。展覽中會懸空掛在一個大型金屬支架上，所以不像參觀畫展在外圍欣賞，參觀者可以走到裡面，抬頭觀看我的家庭照和故事。而那些照片和畫作，均會被泡泡紙的影象隔着著，就像是以「保存」（preservation）之名將之與我們的記憶分隔、移除，彷彿把自己隔絕於歷史，隔絕於自己的過去。我一向認為，藝術是一種暗示（suggestion），一種啟發（inspiration），它讓我們有想像的空間。透過畫像，令一些被我們曾經擁有，但已被遺忘的事物重新顯現。我們明明珍愛著一些事物或價值，卻沒有重視它們，甚至選擇保持距離。

Q: 展出的家庭影像有何挑選準則？背後有什麼故事或記憶？

那些照片有很多不同的面向，當中人物包括我、爸爸媽媽和婆婆，但全都在未填海前的沙田拍攝。有一些是我仍是手抱嬰兒的照片，婆婆和爸爸抱著我，在當時正宗的沙田畫舫前合照（現在那隻是後期建造的屎屎建築，乃贗品）。另外有一張照片是媽媽與婆婆在舊日沙田火車站的合照。小時候，因為公公的祖先牌位放在原初的西林寺，所以常到沙田拜祭，像去旅行一樣。當年我們住在佐敦道，就是現時填海變成西九文化區的那一邊，那時一行四人：婆婆和媽媽帶著我與弟弟，乘計程車到尖沙咀火車站。我還記得的士車費是港幣兩元。雖然我已忘了火車站的模樣，但對搭火車到達沙田後的照像倒仍有印象，步出車站有一條路，沿途都是小食攤檔，

賣炸豆腐、炸蕃薯，有點像現時大嶼山。沿路一直上山，更會有山水豆腐花賣，因為當年西林寺仍有天然溪水，用來做豆腐花。

沙田是對我很重要的地方，有很多與家人的美好記憶和感受，當時我仍是小孩子，對沙田的印象就是簡單的地方、樸實的生活。那些照片，我從小看到大，即使我不記得那些事件，但我卻知道自己曾在那裡出現過。這就是兒時家庭照的特質，有點詩意。那個小孩身體其實並不代表我，因為我當時只有幾個月至一歲左右，根本仍未意識到「自己」這回事，但這些照片卻呈現了「我」的過去和回憶，曾到訪西林寺和沙田畫舫。

Q: 今次在沙灘角落展出你與舊日沙田的回憶，是為了讓大家重溫過去嗎？

我想強調一點，挑選和展示這些影像並不為了懷舊，反而希望它們是啟發性的。這些照片提醒了一種過去的生活方式，當中也有一些我們曾經覺得重要而且珍惜的價值，而這些價值即使過去了，仍然可以對我們有幫助。「歷史」是過去發生的事，但我並非以最直接或狹義的方式去理解它，而會視它們為個人化的過去，一些仍然與我有關連的事物。可能因為我是歷史迷，總覺得香港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後現代的都市，人們有意識地拒絕歷史，因為歷史是不方便的（inconvenient），也是費時的、不有趣的、沉悶的，也許亦單純因為情感上的愛恨交纏，所以思考家族歷史是痛苦的。不錯，關心過去似是浪費時間，但人生又有什麼事不「浪費時間」呢？

Q: 那你一直都關注這些被丟失的個人和文化歷史嗎？

我一直不知道家族史是那麼重要，因為全家人都愛童年說故事，一切記得的經歷，都愛分享給我們聽，所以真是從小聽到大，反而認為擁有這些故事是理所當然的。後來修讀藝術的過程中，也沒想過要做家族相關的主題，因為那時候太多事情發生，太多要學和做的事，便沒太多空間醞釀。

其實一直都喜歡畫人像，小時候七、八歲看畫書最深刻和喜歡的都是人像，但由美國回港後，我不太能適應，沒怎麼畫畫，開始做起一些穿戴物（wearables），後來再嘗試在具像繪畫領域找些突破，於是畫了一些半抽象半具象的作品，就有了《Paradise》系列，後來又摸索了一段時間，做了人像畫系列《Objets d'amour》。

當時不太了解自己為何會做這些作品，直到嶺南大學當駐校藝術家時做了《That Moment Now》才發現，其實穿戴物的創作，正是我意識到自身文化遺產的初體驗，它們也是我對家族承傳下來的香港廣東文化的一些回應。「嶺南」這個名字使我充滿幻想，因為嶺南就是廣東，立時使我聯想到家庭、童年。即使我的身份認同是屬於美國加洲的，但我另一個身份認同一定是「Hong Kong Cantonese」。於是我開展了一些創作計劃，結合了穿戴物和人像畫，之前那一切的創作和探索都成立了，能好好融合起來，也開啟了我現時對身份認同和記憶的關注。

Q: 你說自己的身份認同同時包括加洲和香港，而你接受西方藝術教育，主要媒介是油畫，然後關注香港及廣東文化，這些身份和追求有沒有需要調和之處呢？

可能因為我是一個「thinking person」，總是在思考很多問題，事物從何而來，或者為何兩者如此相關。我對西方藝術的追求，以及個人記憶的探索，兩者在視覺上似有很大距離。因為我的媒體是繪畫(油畫為主)，它本源絕對是西方的，但我作為繪畫的人，必須通過深入的學習和理解，去汲取營養，才能透過此媒介，去表現自己所關注的課題。對媒介的熱愛和身份認為之間並無矛盾。其實藝術創作與研究很相像，需要運用想像力，在不同的媒介、主題中找出新的、精彩和刺激，同時也深入的東西，不但需要知性，更需要熱情。

Q: 除了個人作品，你也舉辦工作坊讓參加者發掘個人家族故事？

工作坊有五個學員，最初的四節是畫畫練習，帶他們在室內與戶外學習構圖。第二部份則是讓他們設計穿戴飾物，主題是「The Loved Ones」，有學員正懷孕，所以用兒子作主角來設計；也有學員圍繞自己來創作。他們很有心思，有人準備了一些很漂亮的紙品，也有特地剪下利是封上的花樣，帶到工作室來製作。因為那是他們的個人創作，由設計到材料準備以及製作，都由他們主導，我只是從旁協助。而觀察整個過程下來，他們能夠創作出屬於自己作品的作品，真的很令人高興。